

汉代多彩的饮酒文化

——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出发

袁兴钱 黄华清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相传黄帝时，负责管理粮食的杜康在苦思冥想储粮方法时发明了酒，至此酒成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喜爱，在几千年的饮酒过程中，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酒文化”。两汉时期，经济发展，国力强盛，饮酒之风盛行，且形成了其独特的酒文化。

两汉时期皇室贵族阶层的礼酒文化

西汉初期，为了稳定秩序，政府实行“禁酒”。但重要礼仪场所不在禁酒之列。在祭祀或节庆之时，以酒事神是重大的礼仪活动。《史记·礼书第一》“大羹玄酒，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节文。”“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大飨即指祭祀先王的祭祀。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中有两条和礼酒文化有关：其一：□诸侯，王饮酎其庙，沃。（海昏侯墓出土）西汉的“饮酎”，是为宗庙祭祀时献酒之礼。《礼记·月令》：“是月也（孟夏之月），天子饮酎，用礼乐。”可见饮酎之礼是立夏之时，天子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的礼仪制度。

两汉时期实行郡国并行制，除了长安国都可进行庙祀外，地方王国、侯国也可进行宗庙活动。

汉高祖时曾下令在诸侯封地立宗庙。“（高祖十年）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汉书·高帝纪第一下》）至孝惠帝时，诸侯王在封地祭祀宗庙制度进一步明确。前195年刘盈即位，“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史记·高祖本纪第八》）

汉高帝时置豫章郡，域内二十一城，其中海昏为侯国。“其明年（元康三年，前63年）春，乃下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汉书·武五子传第三十三》）四月，刘贺前往豫章郡海昏县就国。正是有了高祖十年及孝惠帝时的两条文书，所以才有海昏侯在封地从事庙祀的活动，且以简牍记载下来。

其二：史（跪）曰：“献事毕，请就酒。”王之东相（廌），就坐。（海昏侯墓出土）

《汉书·礼乐志》有云：“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此即指帝王从事庙祀时的礼乐制度。帝王至宗庙东侧的厢房，饮酒听《永安》之乐，至此美礼既成。海昏侯墓出土之简牍，当如此制。

在宗庙祭祀时，汉承先代之制。按先秦之制，“凡祭



东汉羊尊酒肆碑（拓片）
1955年四川彭县出土，高25.3厘米、宽42.5厘米

宗庙之礼……酒曰清酌。”（《礼记·曲礼下第二》）“郊血、大飨腥，三献燂，一献孰。致敬不啗味，而贵气臭也。诸侯为宾，灌用郁鬯，灌用臭也”（《礼记·郊特牲第十一》）郊血，祭天之礼；大飨，祭祀宗庙之礼。此两祭用三献礼，即献、酢、酬。灌，即献酒之意，指天子使宗伯给诸侯献酒。清酌，即指清酒。海昏侯在走完复杂的宗庙祭祀程序（三献礼）后，才能坐下来享用清酒。

综上，此两条简牍当为海昏侯在其封国从事宗庙祭祀活动的记载，且其“饮酎”之礼同长安庙祀。

两汉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乡饮酒文化

乡饮酒是西周时期地方乡大夫宴请地方贤良和长者的一种礼仪。《礼记·乡饮酒义》云：“乡人、士、君子，尊于房户之间，宾主共之也。”此即指乡饮酒流行的群体。此类活动多在学校举行，郑玄《三礼目录》说：“《乡饮酒义》者，以其记乡大夫夫宾于庠序之礼，尊贤养老之义也。”庠序即指学校。

士大夫阶层在举行乡饮酒时有一套规制，如党正正齿位时“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待。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礼记·乡饮酒义》）

举行乡饮酒的场合，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宾贤能，即大比之时，宾礼贤能；二是党正正齿位之时；三是州长春秋习射于序时；四是诸侯升乡中贤者之时。

乡饮酒礼之功用主要有“明尊长”“明养老”，“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礼记·乡饮酒义》）《射义》亦云：“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可见，乡

商周时期的青铜鸟形尊

刘丹

中国青铜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在品种繁多、制作考究、造型精美的青铜艺术珍品中有一类形制特殊的器物：器物整体模仿鸟类造型，具有雕塑的特点，称之为“青铜鸟形尊”，是无提梁的鸟形容器，而那些只在器盖、耳、腹、腰、足等局部做鸟类造型的器物则不属此类。

青铜鸟形尊的分类

青铜鸟形尊主要流行于晚商至春秋战国间。本文共收集到24件，依据形制和装饰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鸱尊，共计10件，均为晚商器物，以头为器盖。A型，殷墟妇好墓出土鸱尊两件，形制基本相同，尺寸不同，装饰复杂，纹饰遍布。为商武丁时期。B型，鸱尊形体较大，形象生动写实，共3件。美国皮斯百博物馆收藏1件；美国敦巴顿顿俄斯科图书馆收藏1件；河南安阳殷墟出土1件，现藏于美国。C型，形体略小，形象较生动写实，装饰更加复杂，共3件。《中国青铜器》中著录1件。《商周彝器通考》中著录1件。《商周彝器通考》中著录1件。D型，形体小，整体形象也不如之前的生动，但更具有传统青铜容器的特点，共两件。《中国青铜器》中著录的“亚兕”尊；《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中著录1件。

鸮尊，共计4件。A型，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地出土两件，形制相同，尺寸不同。为站立状，器口在背上，尾部较有特点呈长方形，两侧为阶梯状。西周中期器。B型，山西太原出土1件，现藏于美国佛利尔美术馆。头似鹰，形象较写实，以头为盖，周身装饰浮雕纹饰。后颈有鸟书铭，云“子作弄鸟”。春秋晚期器。C型，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出土1件。昂首挺立，有冠，背开小口有盖，盖有链条与虎形提梁相连。尾下设一虎形支脚。通体浮雕羽翼，细刻羽毛，为晋国青铜器代表作品。春秋晚期器。

凤尊，共计4件，均兽背安盖。A型，现藏于美国芝加哥1件。形体较短，短尖喙，头上双角与龙角相同，此为商代凤的形态之一。尾部下垂呈曲尺状内卷，腿粗壮无爪，盖上有三道棱脊。晚商器物。B型，山西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1件。伫立回首，头微昂，高冠直立。离体丰满，器盖钮为一只小鸟。凤尾下设一象首，与双腿呈三点支撑。颈、腹、背饰鳞片，两翼与双腿饰云纹，翼、盖间饰立羽纹，以雷纹衬地，尾饰华丽的羽翎纹。凤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西周早期器。C型，河南洛阳马坡出土1件，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头似鸡，头顶柱状龙角高冠，周身饰变形鳞片，以大涡云纹为羽翼，项上有铭文2行12字“守宫扬王休，乍；父辛尊，其永宝”。西周中期器。D型，现藏于新保利艺术博物馆的“卽季”凤鸟尊。头顶花蕾状高冠，背部盖上有挺立一只小凤鸟。大小凤鸟通身均饰鳞片羽纹、羽翼饰夔龙纹及雷纹。尊盖内侧铭文标明它为嬴氏家族某位成员所作的青铜礼器。西周器物。

鸭尊，共计2件，背上有杯形侈口。A型，辽宁喀左马厂沟青铜器窖藏出土1件。双圆目，扁喙，长颈，双爪有蹼，尾部有一支柱，器口在背上为杯形侈口，颈腹部饰方格纹，腹部以涡云纹为羽翼。西周早期器。B型，现藏于美国福格博物馆1件。扁喙微启，颈较短，盖用链与后尾

相连，底有器座，身饰云雷纹、涡云纹，以变形凤鸟纹为羽翼。春秋晚期器。

鸳鸯尊，1件。A型，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出土。环状冠，长尖喙，颈较长，背部有喇叭形侈口，有蹼，身后尾略垂，下端有支柱，与双足构成稳定的支撑面，通体无装饰。西周早期器。

雁尊，共计3件，兽背为盖。A型，现藏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1件。头顶有冠，尖喙，细长颈，腹部半立体羽翼，背上有带圈足的圆形器盖，有蹼，颈部饰羽毛纹，周身饰网格纹。春秋器物。B型，《中国青铜器》中著录1件。长颈，扁喙，圆形器盖上有圆环，无羽翼，扇形尾部平翘，腿粗壮，有蹼甚大。颈部有鳞片，背部饰云纹。战国时期器。C型，《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中著录1件。颈长前曲，扁长喙，背部器口较小，上有提梁，提梁两端有立体的虎，尾部呈扇状上翘，无纹饰。战国时期器。

青铜鸟形尊的时代特征

目前所知动物形鸟形尊最早出现在晚商，殷墟妇好墓所出商武丁时期的鸱尊是年代较早的一件。之后不断发展，到西周时最为鼎盛，春秋战国时衰落，后基本消失。对以上各类型青铜鸟形尊按时代进行排比，分析其在不同时期的造型与纹饰等特点。

晚商时期 晚商是青铜礼器开始进入鼎盛的时期，青铜鸟形尊便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在数量和种类上，青铜鸟形尊有鸱尊10件、凤尊1件。其中以鸱尊为主，目前除商代外未见于其他时代，可能是晚商时独有的。

青铜鸟形尊采用的动物原型主要为现实中存在的动物，器物造型上也比较写实，没有太多艺术加工。此外，作为早期的鸟形尊，在形制上还未摆脱传统青铜容器的特征，如“亚兕”尊就没有生动的喙、耳、羽翼，更具容器特点。

纹饰方面，比较发达，多遍布全身，偶有素面，器身多出棱脊，均身饰鳞片，以大涡云纹或浮雕的卷龙纹为羽翼，此外还填以云雷纹，凤尊以上窄下宽的柱状龙角为特征。

西周时期 西周是青铜鸟类尊最发达的时期。目前发现的青铜鸟形尊在数量虽不及晚商，但种类却明显增多，有鸱尊2件、凤尊3件、鸭尊1件、鸳鸯尊1件。鸱尊在这时消失，凤鸟尊继续延续并繁盛起来，新出现鸮尊、鸭尊、鸳鸯尊等，工艺也更加精美。这种变化应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及铸造水平的发展，以及西周时期礼乐制度的加强和完善有关。而凤鸟尊主要流行于西周，或是因为凤鸟在西周时是国家兴盛和祥瑞的标志。

青铜鸟形尊采用的原型大多是现实存在的动物。西周早期鸟形尊造型非常写实，到中西期在写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很多艺术创作，与商代相比造型更加生动。尊的形象不仅体现鸟类静止的状态，还有动态的，如奔跑状的鸟形尊。这说明西周的工匠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对动物原型有了更细致入微的观察，能把动物的不同形态予以体现。

纹饰方面，西周早期已不像晚商那样纹饰遍布，有些器物只在局部装饰，个别甚至全无，繁缛程度大大降

低。纹饰种类继承晚商风格，无太大变化，仍是身饰鳞片或菱形网格纹，以大涡云纹为羽翼，有的为浮雕，凤尊为单高颈，整体形象更加瘦长飘逸。西周中晚期则多饰变形的鳞纹和波曲纹，除以涡云纹为羽翼外，还有由浮雕的夔纹和雷纹组成的羽翼，凤尊在这一时期较为流行，有柱状、花形等多种冠。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青铜鸟形尊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减少，有鸱尊2件、鸭尊1件、雁尊2件。新尊型有雁形尊，其余都是已有尊型，说明动物形青铜尊开始进入衰退期。

有些青铜鸟形尊在形态上依然保持写实的特点，有些则不然，已不再刻画出羽翼，不如商、西周时生动。纹饰与西周中晚期近似，但更加规矩和精细。多身饰鳞片、网格纹，以弦纹或变形凤鸟纹饰出羽翼。

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的青铜鸟形尊，数量稀少，类型单一，是其发展的最后阶段。本文中统计只有雁尊1件，形象较为写实，器盖很有特点，设计巧妙。装饰方面十分朴实，基本无纹饰。

在诸如冬至、正旦、年终等节庆日汉代人也有饮酒之习俗，且进酒次序与今截然不同。“正月之朔，是谓正旦，躬率妻孥，洁祀祖迎。及把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称寿举，欣欣如也。”（《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汉代民间正月进酒次第，当从小起，以年少者为先，此为汉代饮酒之礼。正月饮酒年小者先行，寓意着小者长岁，所以先贺酒饮之。老者失岁，所以后饮酒。

（本文为2022年江西汉文化研究中心课题《从江西汉墓出土酒器管窥汉代饮酒习俗》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2W19）

海昏侯刘贺墓车马坑

出土当卢纹饰初探

桂艳琴 周里玲



图1

图2

海昏侯刘贺墓车马坑出土当卢多达106件，分圆形、叶形、葫芦形、桃形、椅角形和圭形，共六类十四亚型，技法高超，纹饰精美、等级较高，为研究我国传统造物设计文化以及文明交融的西汉王朝提供了珍贵资料。

元素角度分析：图案元素组合，通过要素选择、调整布局与微末，避免雷同，已达各具特色效果。刘贺墓车马坑当卢以组合图案元素为技法装饰多出现在椅角形与圭形类型中，以篆刻为主，因陪葬坑出土且篆刻浅细槽特性，尚无法辨认图案元素全部细节，现以两组四件标本为例，展开探讨当卢组合图案元素。

一组是标本12XGDK1:1208（图1）与12XGDK1:1298，12XGDK1:1208纹饰较清晰，最上端为两只凤鸟共含琅玕，凤鸟昂首曲颈、展翅垂尾、单脚伫立、另一脚相抵。双凤尾羽下方各饰一羽人，羽人昂首，向内单脚跪拜，双手伸展，一手在前、向上托举，一手身后、手心翻转向上，呈祈福祷告状。羽人下方饰交龙，双龙首尾相对，昂首吐舌、舌尖相抵，身交呈两环，近相交处腹部均为两肢朝外、两肢向内，上环内饰一展翅飞升神鸟，下环内两只神鸟、一上一下，尾羽处一龟在末端。12XGDK1:1298图案元素与前者相同，均为凤鸟衔珠、羽人、交龙、神鸟与龟、布局也相同，一处细节当卢末端龟明显不同，前者位于交龙尾中央、昂首曲颈、长颈与一龙尾紧靠，似抬首望龙，后者居两龙尾下方，虽亦昂首，幅度不大，关联两者画面，龟似动态。

另一组是标本12XGDK1:1419与12XGDK1:2166（图2），主体纹饰为相交双龙，双龙昂首张嘴、长舌吐出、舌尾蜷曲、身交两处，尾亦相交呈闭环。交龙上方与双尾闭环处各刻一神鸟，尖喙短颈、展翅直飞。不同于在休憩双龙身上神鸟数量，前者一只、位于双龙身交两处而形成的环内，后者两只位于双龙首部与身交中间、一左一右。

对比四件标本，虽均为鎏金篆刻神兽圭形当卢，但图案元素选择不同造就整体画面成为两组类别，同时各类通过调整元素布局与微末，避免雷同，使纹饰各具特点，展现了海昏当卢纹样丰富的特征。

艺术角度分析：艺术风格多变，幻想浪漫与具象写实，“精巧”与“稚拙”并存。刘贺墓车马坑当卢纹样构图大气、元素多变、线条简练，组合纹饰常见上下穿插，不盲目追求对称，云纹的流转运用与弧线的延伸任意，增添了画面的灵动洒脱。其纹饰既有幻想浪漫的龙、凤鸟、金乌、神鸟等神兽与羽人，也有狼、鹿、麋、牛等写实的具象动物，前者彰显神秘灵性，后者昭示质朴大方。

同时，大量当卢纹饰线条走向流畅、似行云如水，工匠以巧妙工艺制作灵动纹饰，艺术风格尽显“精巧”。但不少当卢装饰技法略显“笨拙”，线条运用对比稍显“稚嫩”。以前面所述两组标本为例，正是“精巧”与“稚拙”风格并存的典型代表，两组标本均篆刻神兽纹，第一组交龙尖牙杏目，身躯比例匀称、线条圆润流畅、简单干练，将龙的霸气与兽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而第二组交龙圆目卷舌，身躯比例不匀称、线条略显随意与洒脱，刻划出可爱与活泼龙的形象。尤其后者篆刻神鸟线条更显随意，寥寥几笔简单线条构成飞向天际的神鸟形象，用稚气描绘神秘世界，极具特色。此外，模型捶打与篆刻工艺的灵活运用，为刘贺墓车马坑当卢多变的艺术风格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精品纷呈。

文化角度分析：文化意象深厚，主要有以珍禽瑞兽表达祈福长生和以猛兽捕食具象勇武力量两种寓意。刘贺墓车马坑当卢除少数素面或乳钉纹外，其他纹样主要蕴涵两类精神风貌。

一类是通过珍禽瑞兽（含单体与组合）的神性，表达向神灵祈福、甚至另世重生、灵魂不灭以达永生长存的美好期冀。以《海昏侯墓地符号世界：当卢纹饰研究》和《海昏侯墓出土当卢纹饰图像试释》为代表的系列论文对这类纹饰做了专题研究，提出海昏当卢纹样构建了海昏国人对于彼岸世界认识、四神崇拜等学术观点，虽各有差异，但将其他动物灵性赋予，提升其神性，以珍禽瑞兽表达美好期冀的基础观念是一致的。

另一类则是描绘猛兽捕食画面，例如标本12XGDK1:57（图3）小狼噬牛图案、标本12XGDK1:401（图4）双狼逐鹿均是此类纹饰，通过猛兽追捕、噬咬猎物的紧张画面将动物的力量与速度具象化，运用在车马额饰的当卢之上，以赋予马猛兽的力量与速度，彰显马主人勇武形象。除这两件标本，此类纹饰在刘贺墓车马坑其他车器如狼追逐鹿图案的鎏金花瓣形青铜盖弓帽、刘贺墓玉石器如双狼噬猪纹石嵌饰，以及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如四只猛虎两两成对咬住牛的长方金牌饰亦是体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中国北方狄—匈奴系统文化（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溯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历史上匈奴称“胡”、属游牧民族，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反映了他们以畜牧和狩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和工艺技术方面的交流。刘贺墓车马坑当卢此类纹饰的发现是汉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的有力佐证，凸显了西汉王朝文化包容多元的特点与魅力。

（本文为2022年江西汉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海昏侯刘贺墓车马坑出土当卢综合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2WW25）



图4